

近代晚期粤东客音研究

田志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晚期粤东客音研究

田志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晚期粤东客音研究 / 田志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372 - 5

I. ①近… II. ①田… III. ①客家话—研究—广东省—近代
IV. ①H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31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393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历史文献比较研究的有益尝试

——序田志军《近代晚期粤东客音研究》

刘晓南

(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从上世纪初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通过排比汉语方言语音、比较异同、来拟测中古音的音值取得巨大成功以来，十九世纪曾是西方显学的历史语言学，一反其原生地逐渐式微的颓势，在世界的东方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二十世纪以来在汉语语音史研究领域，无论是通语史还是方言史，排比现代方音、比较内部差异以推测其历史语音的“高本汉模式”，逐渐成为考求或构拟历史音韵的重要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方法。当然，丰富多彩的现代方言，犹如一座储量之大无法计量的矿床，可以给历史语音的比较研究源源不绝地提供各种原材料，这种方法作为支撑汉语语音史宏大构架的强大基石也是当之无愧的。相较之下，同样蕴藏丰富的历史文献语言，在这个号称为“历史”的比较研究大潮中则相对冷落。一谈历史比较，势必现代方言，似乎成为围棋策略的“金角银边”定式，牢不可破了。

我想问，历史文献所记的语言，同样来自它所在的时代，也是当时口语或方言的实录，在研究它所在时代的语音的过程中，为何遭此冷遇？无论是再弹汉字不表音之类的陈辞滥调，还是认定文献语言过于封闭呆板、缺乏生气，还是指责文献脱离口语，不论怎么说，我还是想问：我们对文献语言到底了解多少？我想，汗牛充栋的汉语文献能不能作为历史比较的原材料，这不应该是一个理论问题。坐而空谈，不如试作践行。需要的是精力财力的投入与扎实的调查，开掘文献资源，作出新的研究。田志军《近代晚期粤东客音研究》（下简称田著）就是这样一部立足于扎实的

文献调查,获取了丰富的历史方言语料,经过细致缜密的考证和构拟,求得若干个约两百年前粤东客家方言点的音系,再通过对这些由历史文献考得音系的比较研究,构建了近代粤东客方言音系的新著。这个音系,堪称汉语语音史上第一个来自历史文献比较研究的历史方言音系,毫无疑问是语音史研究中运用文献语料进行比较研究的有益尝试。我认为这是大家应该肯定的。

我们都知道,客家人是华夏大家庭中一个充满传奇的民系,历史上曾经聚族辗转而迁故被名为客,客家话也因此而成为汉语中唯一不以地名称呼的方言。她伴随客家先民的足迹,犹如点点繁星,散落在南方与沿海诸多省份,甚至远播海外。她在我国南方“安家立业”的历史并不久远,但词汇之典雅、语音之古朴,无一不显示她的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古老华夏文化印记,使她本身也一如辗转迁徙的客家人一样充满了神奇。其来源如何,早期的状况如何,系属如何,历史上曾经有哪些变化等等问题,不但饶有趣味,而且是汉语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了探讨客家方言语音的历史,逐渐补上汉语史这一重要缺环,作为客家的一员,青年语言学者田志军同志就是带着这样一份厚重的期待,满怀对母语的崇敬,投入客家方言历史的研究。

田著的研究仍然从调查开始。与通常仅作田野调查不同,志军双管齐下,即在对现代客方言进行田野调查的同时,下大力气深入历史文献领域,调查发掘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传教士所作的客家方言的系列文献。然而这种调查的困难比起当代客家方言的田野调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文献都是一些特殊人物、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为一个特定的目的而制作的,虽然初刊行时数量颇丰、区域内传播亦颇广,但时过境迁,风光难再。不但未能重版,而且大陆本土几乎没有收藏,仅存的少数本子都藏于境外、国外。志军克服经费、时间的不足,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收集到藏于香港、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诸多文本,从中选取可以确认是出于粤东地区的罗马字记音客家方言语料,作为近二百年前粤东客家方音的原始语料。有下列四种:

一是新安罗马字《新约》,包括《马太福音》1866年修订版、《路加福音》1866年版、《马可福音》1874年版、《使徒行传》1874年版和1879年版的《约翰福音》。

二是五经富罗马字《新约全书》,此书由中国牧师彭启峰编译,玛坚

绣 (M. C. Mackenzie) 等牧师审订, 1916 年初版, 1924 年修订。

三是《客英词典》, 1905 年初版, 英国长老会纪多纳 (Rev. Donald MacIver)、玛坚绣著, 上海美华书局印刷出版, 正文 1216 页。

四是《客法词典》,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赖嘉禄 (Charles Rey 1866—1943) 神父著, 初版于 1901 年, 增订版 1926 年由香港巴黎外方传教会那匝勒 (Nazarath) 印书馆再版, 正文达 1441 页, 篇幅超过了纪多纳、玛坚绣的《客英词典》。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四个文献的相关信息, 一是表彰材料收集之艰辛, 二是借此展示近代客方言文献材料之丰富, 以鼓舞有志于语音史的历史比较研究的同道对文献语料的信心。四种文献累计近 4000 页, 全是用西方拼音文字所记写的二百年前客家方言语音。这是多么宏大的一个客方言历史语音宝库,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笔文化遗产!

做好语料收集固然艰苦备尝, 而为了论证四个文献的“基础方音”而考证译写者、编著者的生平经历同样困难重重, 因为正统的史籍对那个时代的教会人物尤其是编译人员很少留下详细的纪载。为了考证上述资料编者背景及生平, 获取语料的必要资讯, 志军深入粤东地区, 查检地方文献, 考证三个近代外国在华教会的背景, 走村串户, 现场取证, 访问乡野, 追踪前人, 探故神父之墓穴, 过前教民之旧庐, 终于查清了几种文献的真正编著者, 堪称重要发现, 首次揭示西方传教士所刊印之拼音文字方言读物中多有中国教众之贡献, 确认四种粤东客话语料中, 五经富客话《新约全书》出于中国牧师彭启峰之手, 其他几种文献也有中国学者的参与。扫清了迷雾, 确定了语料的准确可靠, 犹如茫茫大海出现了灯塔, 给确定语料的基础方音指明了方向。根据从事编译的中国牧师或辅助外国神父的中国学者的生平籍贯、所操母语, 初步判定四种材料分别属于粤东新安 (今深圳香港)、五经富 (今揭西县) 以及嘉应州 (今梅州市) 等地方音。看到这, 我不禁想起了陆游的“尔欲学作诗, 功夫在诗外”诗句, 找书, 考查作者里籍, 好象不是做语言学, 但它确实是做好语言学的“学外”的必备功夫。

四个方言文献的成功获取与确认, 为实现近代粤东客音史的战略构想提供了有力保障。基础已打牢, 下面的工作虽然仍然艰巨, 但已经可以依计划、按程序而行动了。首先进行罗马拼音文字与汉字的对应识读, 提取本字, 获得罗马字记音的客家方言字音达 12026 个。再切分音节之音素,

归纳音类,确认声、韵、调系统。再与香港深圳、揭西县五经富镇以及梅县等现代9个粤东客家方言点的语音进行内部差异的比较,构拟音值,结合文献编者的里籍,与各点对比异同,首次获得四个约二百年前粤东客家方言音系,并确立了其所代表的方言点:一是新安罗马字《新约》所记录的香港深圳客家音系,二是五经富罗马字《新约》所记录揭西客家音系,三是《客英词典》所记录的五华客家音系,四是《客法词典》所记录的梅县客家音系。四个音系大同小异:声调都是6个,声母则《客法词典》21个、《客英词典》与新安《新约》23个、五经富《新约》24个;韵母则新安《新约》51个、五经富《新约》49个、《客英词典》51个、《客法词典》65个。

有了准确的时空定位之后,再来看四个音系的大同与小异,其价值充分显现,大同则同属于约二百年前的粤东地区范围内的客家方言,小异则各自又有因分布空间不同而产生内部差异。正如赵元任所说“原则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见的差别往往也代表历史演变上的阶段。所以横里头的差别往往就代表竖里头的差别”(《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4页)。四个音系表现的空间差异(横里头的差别)应当就是从时间上的演变发展而来。故此结合历史考证的结果,以空间分布显示的内部差异作为主要特征,进一步作历史上共时层面的比较,拟测它们的共同来源,由此得到所谓早期粤东客家方言音系:声母23个,韵母53个(其中阴声韵18个、阳声韵18个、入声韵17个),声调6个。

至此,由早期粤东客家音系到二百年前的四个粤东方音系再到现代粤东客家方言,一条由三个环节构成的粤东地区客家方言语音的发展链条初步成形。链条显示,从早期粤东客音到二百年前左右发生了一次分化,再经过约二百年的演变终成为现代粤东诸客家方言的格局。尤为可信的是关于粤东客话近二百年来变化,这是立足于文献实体的全面记载、纵向与现代语音比较、疏理出来的一系列时空明确的音变条例,如:圆唇化舌根声母消失;精庄知_二、知_三章分立格局瓦解,齿音合流;明微泥日疑等次浊声母变读全浊;六元音格局变动;舌尖元音产生;蟹、山摄二等出现介音,山摄三等介音消失;山摄三四等主元音低化;声调浊去变上等等。其中每一条演变规律都论据充分、信而有征,近二百年来在粤东地区客家语音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至此有了明确的述说。这对于客家方言史乃至汉语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我们早就看到,利用传教士文

献或其他文献考察某一个近代方言音系，在吴语、闽语、粤语甚至于客家等方言史研究中早已有不少成果，“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但田著的意义就在于将历史文献与现代方言有机的结合的基础之上，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历史平面上的共时比较。我们通过田著，看到了在现代历史语言学的语音史、方音史论著中罕见的对历史文献进行的历史比较研究，这无疑为历史比较法的一次有意义的拓展与补充，它将有力地扩大历史比较研究的范围，充实和丰富历史比较的内容，推动历史语言学中汉语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终将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

最后，似乎还有一个疑惑，田著使用的文献语料属于拼音文字的方言记音，与汉字记录的文献是否不同？以西方拼音文字实录当时方言语音，是不是高于汉字文献的价值？

客观地说，拼音文字的表音功能确要强于汉字，但也不必作过高的估计，因为采用历史上不同系列的拼音文字书写的方音语料，终究不是统一的万国音标式的准确记录。这也是迄今为止，无论哪种拼音文字记的历史语料，都必须进行声母、韵母和声调的考证和确认，都必须根据内证外证，构拟其音值的原因。不但这些要做的工作与汉字文献一样，而且研究结论也常常存在歧异或不同的理解，如《西儒耳目资》即是如此，虽然研究成果众多，可是至今仍有分歧。可见，虽然拼音文字文献有侧重于记音的优点，但通过它们进行的历史方音研究工作在程序上与用汉字文献研究要做的工作几乎完全一样。

至于实录当时方音，汉字文献也从不缺乏。鲁迅《门外文谈》说“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即算是《尚书》那样诘屈聱牙，在当时也是“用民间之通语”记写（宋人陈骙《文则》语）。林语堂说“语言不但有时间上的不同，而且有地理上空间上的不同，在文言未结晶标准语未成立时期，一切的稿本都含着方音性质。时代愈古，方音的成分愈多。”至于古代的语言学家，虽然重文言，但也不乏重视口语方言，不要说扬雄连续 27 年“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槧”，也不说南北朝时“锋出”的“各有土风”的韵书，且看明代的音韵学家徐孝在编制《合并字学篇韵便览》的等韵图时是如何做的：“今复重订。于万历三十年正月初三日起，至二月二十五日止，查录过有形等韵一千四百九十音，无形等韵一千七百二十六音，共三千二百一十六音。”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核查旧

等韵的有形与无形，这难道不是一次方言语音的系统调查与核实？

文献，只要将口语写成文字就是文献，古人的口语记录或摘要是文献，今天方言调查报告，明天就是文献。所以，中国古代韵书是文献，二百年前传教士所作方言读物（土白圣经、字典词典、课本等等）是文献，赵元任上世纪二十年代记录的南京音系，现在就已经成为一百年前的南京话文献。文献跟口语绝不是互不关联的对立物，恰恰相反，文献与口语相辅相成，是口语的流动的声音形象向稳定的视觉形象的转换，是口语的时间和空间的延展，更是口语历史状态的保留。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研究中不但不应当排斥文献语言，而且应当积极发掘，与口语共同展开研究，以取得历史语言学的全面科学构建。这恐怕是田著能给我们的又一点启示吧。

2015年4月19日于复旦光华楼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粤东客话的地位及其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西方教会与粤东客家方言	(15)
第三节 粤东教会客话文献研究及相关问题	(41)
第四节 研究的方法、思路、步骤	(59)
第二章 声母系统	(73)
第一节 声类及其拟音	(73)
第二节 声母内部差异	(130)
第三节 声母系统及其特点	(135)
第三章 韵母系统	(151)
第一节 韵类及其拟音	(151)
第二节 韵母内部差异	(220)
第三节 韵母系统及其特点	(229)
第四章 声调系统	(246)
第一节 调类及其拟测	(246)
第二节 声调内部差异	(261)
第三节 声调系统及其特点	(262)
第五章 近二百年粤东客音演变	(270)
第一节 基础方音	(270)
第二节 声母演变	(273)

2 近代晚期粤东客音研究

第三节 韵母演变	(289)
第四节 声调演变	(311)
结语	(316)
附录一 发音合作人情况	(319)
附录二 晚近粤东客话音系	(320)
附录三 现代粤东客话音系	(328)
参考文献	(343)
后记	(355)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粤东客话的地位及其研究综述

一 粤东客话的特殊地位

(一) 粤东概况^①

粤东系指广东省东部地区，东接闽西、闽南，北交赣南、粤北，西接粤北、粤中。通常包括今梅州、惠州、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六个地级市，此为狭义的粤东。从广义上来说，珠江口以东的地方均可称粤东，因此东莞市、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②也计算在内，这一地区主要由广梅汕铁路连接。本书所指称的粤东即指广义的粤东，大部分即所谓“岭外三州之地”，对应于清行政区划之嘉应州、惠州府、潮州府一州二府旧地。

因行政区划变化，今分出较多区域，为便于举称，我们还是按照旧一州二府的区划来分别叙述。

1. 嘉应州

即今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梅州全境处于东经 $115^{\circ}18'$ 至 $116^{\circ}56'$ 、北纬 $23^{\circ}23'$ 至 $24^{\circ}56'$ 之间。东北邻福建省的武平、上杭、永定、平和四县，西北接江西省寻乌县，西面连广东省河源市的龙川、紫金县，西南、南面与汕尾市的陆河县、揭阳市的揭东县、揭西县相接，东南面和潮州市的潮安县、饶平县相连。最大的盆地是兴宁盆地，面积约 350 平方公里。梅州地处五岭山脉以南，全市总面积为 15899.62 平方公里，85% 左右为海拔 500 米以下的丘陵山地。2008 年户籍人口

^① 粤东概况参考了粤东各相关市县地方志，文后参考文献均予以载明。

^② 今东莞、深圳、香港原为广州府属地，但因靠近惠州府，当年传教士将这一带的客家方言视为惠州客话。本书为讨论方便，亦袭用这一做法，特此说明。

505.28 万人。

民国元年(1912)由嘉应州改为梅县。1988年梅州市升格为地级市,现辖梅江区、兴宁市、五华、丰顺、大埔、平远、蕉岭、梅县计一区一市六县。梅州市除丰顺县小部分地区讲潮汕闽方言外,其余均为客家方言地域。梅州市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与赣南、闽西客家方言地域连成一片,均讲客家方言,被世人视为客家大本营,今梅州市区(原梅县中心区域)也被尊为世界客都。

本书所采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历史语料所涉的地域为今梅州市梅江区和梅县。梅县地处东经 $115^{\circ}47'$ 至 $116^{\circ}33'$ 、北纬 $23^{\circ}55'$ 至 $24^{\circ}28'$ 之间,在广东省东北部,梅州市中东部,东北与福建上杭、永定县接壤,东西宽70公里,南北长110公里,地处闽、粤、赣三省要冲。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辖18个镇,2007年全县总人口61万人。

(1)梅县地理概况。梅县是山区县。境内山峦起伏,西北部有武夷山系延伸而下的项山山脉,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东部、南部有莲花山系的阴那山脉,使县境与丰顺、大埔两县分隔。这两列山脉均为东北—西南走向。全县地势四周高中间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分为三个类型,即河谷盆地、丘陵、山地,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有海拔千米山峰23座,明山嶂的银窿顶海拔1357米,为梅县最高山峰。大小河流43条,属韩江水系。主干流梅江,流经县境约75公里,于大埔县三河坝流入韩江。

(2)梅县历史沿革。梅县始建于南朝齐(479—502),时称程乡县,析海阳县置。南汉乾和三年(945)于程乡设敬州,领程乡一县。北宋开宝四年(971)改称梅州。明代撤梅州复设程乡县。清雍正十一年(1733)升为直隶嘉应州。民国元年(1912)撤州改设梅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称梅县,1983年改设梅县市,1988年撤市分置梅县和梅州市梅江区。2007年底,梅县下辖18个镇和1个城区办事处、1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382个村委会和37个居委会。

西晋末年,中原汉人渡江南徙,有一部分后来辗转至粤闽赣三角地带。唐代梅地仍主为畬瑶,客为汉。北宋大量汉人自赣、闽迁来,人口大增。宋末元初(1276),元兵南进,两攻梅州,蔡蒙吉、文天祥率众抵抗失败,元纵兵屠杀,人口锐减。明清两代,原闽西、赣南汉族,陆续迁来,人口逐次增加,成为纯客住县,此后县内居民绝大部分是操客家方言

的汉族。

2. 潮州府

潮州府沿革变易较大,今析为潮州、汕头、揭阳、汕尾四个地级市,习惯上统称为潮汕地区。这一地区行用潮汕闽方言、客家方言。闽客方言之间相互影响,有所谓“半山客”现象。本书所用的英国长老会历史语料所涉的具体地域为原西方在华教会习称的五经富(Wukingfu)地区,实际上是指潮汕客属地区。五经富是原揭阳县的一个乡镇,今属揭西县。但过去所称五经富地区从语言地理角度来看,也可能实际涵盖今揭西、揭东、陆河等县连成一片的客家地域。

(1) 揭西地理概况。揭西县在东经 $115^{\circ}36'$ 至 $116^{\circ}11'$ 、北纬 $23^{\circ}18'$ 至 $23^{\circ}41'$ 之间,北回归线横贯县境。地处广东省东部,位于莲花山支脉大北山南麓,潮汕平原的西部,榕江南河的中上游,东连揭阳,南邻普宁,西接陆河,北与五华、丰顺接壤。揭西是潮汕的一个山区县,境内群山连绵,山高谷深,交通闭塞。县境东西长59.47公里,南北宽约41.2公里,总面积1365平方公里。全县辖20个乡镇,总人口89.23万人,旅居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约54.6万人。

(2) 揭西历史沿革。揭西是一个年轻的县份。196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由揭阳县划出12个公社和1个镇,陆丰县划出五云、上砂2个公社建立揭西县,因在揭阳之西而得名,县政府设在河婆镇。1975年又从普宁县划入贡山、湖西等四乡。

揭西县主要地域原属揭阳。秦汉三国属南海郡。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属东官郡。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属义安郡之海阳县。宋、齐、梁、陈建制不变。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属潮州。唐代因袭之。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揭西地域隶属潮州辖之揭阳县。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并入海阳,绍兴八年(1138)复建揭阳县,均仍隶属潮州。元惠宗至元十六年(1350)属潮州路。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属潮州府。清沿明制,仍属潮州府。民国三年(1914),揭西主要地域隶属广东潮循道辖之揭阳县。

揭西县通行客家话和潮州话(属闽方言)。本县上砂、下砂、五云(以上三个乡原属陆丰县地)、西田、良田、坪上、河婆、龙潭、南山、灰寨、京溪园、五经富、大洋等乡镇操客家话,这些乡镇均在县城河婆镇以北,约占全县人口的56%。大溪、钱坑、金和、塔头、凤江、棉湖、

东园等乡镇在县城河婆镇以南,均使用潮州话,约占全县人口的44%。^①

根据揭西客属地域几个大姓如河婆张氏、蔡氏、黄氏,五经富镇曾氏,五云彭氏、庄氏,龙潭刘氏的族谱记载,各姓大体都在元末明初自嘉应诸县迁来开基。

3. 惠州府(原广州府东莞县、新安县一并讨论)

这一地域沿革变易也较大,今析为惠州市、东莞市、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用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

本书采用的巴色会历史语料所涉的具体地域为原新安县,即今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及东莞市部分地域。因历史原因,香港与大陆曾分开多年,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1) 深圳地理概况。深圳是中国南部海滨城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经113°46′至114°37′、北纬22°27′至22°52′之间。地处广东省南部,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边深圳河与香港新界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市接壤。深圳市行政辖区内土地总面积1952.8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145平方公里,有大、小岛屿24个。深圳全境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形大部分为低山、平缓台地和阶地丘陵。西部为滨海平原,平原占陆地面积的22.1%。梧桐山、七娘山、羊台山、大南山等山脉绵延,最高山峰为梧桐山,海拔943.7米。全市较大的河流有深圳河、茅洲河、龙岗河、观澜河和坪山河等。

(2) 深圳历史沿革。1979年3月,原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同年11月改为省辖市。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并恢复宝安县建制。1988年国务院批准深圳市为计划单列市,赋予其相当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93年,撤宝安县建制改为深圳市属的宝安、龙岗两区。1997年10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增设盐田区,至此全市共辖6个区:特区内4个区,即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盐田区;特区外两个区,即宝安区、龙岗区。2003年,原为特区外的宝安、龙岗两区也转为城区。

深圳是移民城市,人口总量逐年攀升。至200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827.75万人。深圳原住民的文化、习俗、方言正在经受移民大潮的冲刷、荡涤。

(3) 香港地理概况。香港特别行政区位于我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南

^① 林伦伦:《广东揭西县方音研究》,《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4年第3期。

端，处于珠江出口之东，东、南濒南海，西望澳门，北隔深圳河与广东省深圳经济特区相接，在东经 $113^{\circ}52'$ 至 $114^{\circ}30'$ 、北纬 $22^{\circ}9'$ 至 $22^{\circ}37'$ 之间。香港原属广东省宝安县，全境包括香港本岛、九龙半岛南端及新界与大屿山、昂船洲等 235 座大小离岛，总面积约 1830 平方公里。香港岛地势陡峻，太平山最高峰 552 米，是全岛最高山峰。北岸与九龙半岛相对；中间为维多利亚港，面积约 6000 公顷，是世界三个最优良天然港口之一。九龙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称北九龙，英国租借后，称为新界。新界丘陵起伏，大雾山海拔 957 米，是全区最高山峰。在界限街以南的大陆部分，是南九龙半岛。九龙北面一带，山岭连绵，成为天然的屏障。

(4) 香港历史沿革。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0 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 1842 年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56 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于 1860 年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南端即今界限街以南的地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又逼迫清政府于 1898 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九龙半岛北部大片土地以及附近 230 多个大小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 99 年。

今深圳、香港均属于清新安县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先后在南方建立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今深圳、香港地域隶属南海郡番禺县。汉朝隶属南海郡博罗县。晋永嘉丧乱，“五胡乱华”，大量中原人民举家南迁，经江西、福建进入广东。东晋咸和六年（331）置宝安县，隶属东莞郡，就是这次移民大潮的直接结果。隋朝时隶属广州府南海郡。唐朝肃宗至德二年（757），改宝安县为东莞县。宋元之交，大批抗元部队溃败，余众大都逃到南部沿海地区避难或谋生，形成了对岭南，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又一次移民高潮。深圳沙井镇陈氏和曾氏，福田黄氏，松岗镇文氏和陈氏，谷丰镇侯氏，公明镇的陈氏、梁氏和莫氏，西乡镇的温氏和刘氏，罗湖洪氏，香港新界邓氏、文氏、廖氏、侯氏、彭氏等，据谱牒记载均为这一时期自内地迁来。内地人口的大量南迁，促使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至明朝万历元年（1573），遂析东莞县置新安县。清朝初年，为防止郑成功及明遗民在沿海进行的抗清活动，以及倭寇、海盗的骚扰，清政府在康熙元年（1662）实行大规模的“迁界”，沿海各县均内迁 50 里。新安县近三分之二地域为迁界范围，故撤销建制并入东莞县，将境内居民遣往他乡，一时百姓骨肉离散，颠沛流徙，“自有粤东以来，生

灵之祸，莫惨于此”^①。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新安县才全面复界。但土著居民大部分迁往外地已安居乐业。清政府遂自康熙至雍正年间实行免地租、送耕牛、谷物等优惠的招垦政策，吸引了大批农民自嘉应地区，甚至江西、福建等地举家迁来，涌入新安县垦荒，形成深圳、香港地区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其中主要是客家人。

1842年7月至1898年4月间，清政府与英国相继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割让租借给英国。至此，原新安县三分之一土地脱离其管辖，划境分治。民国三年（1913）广东省新安县恢复旧名，又称宝安县。1979年原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成立深圳经济特区，且恢复宝安县建制，隶属特区。1993年，宝安撤县改区，隶属深圳市。香港于1997年回归祖国，设立特别行政区。

粤东是客家民系的基本住地，与赣南、闽西连成一片。早期粤东接纳了许多来自赣南、闽西的客家先民；后来，又有大量的客家人从粤东播迁到广西、四川、江西、湖南、台湾以至海外。粤东无疑是个中转站，与全国乃至全球客属地区联系十分紧密。闽西、赣南是粤东客属的祖地，而粤东又是广东其他地区、广西、湖南、四川、台湾、海外各国各地区客属，乃至江西客籍（所谓倒流客）的祖地。

（二）粤东客话的特殊地位

1. 目前分片情况

粤东客家话大体在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分属粤台片、海陆片。

^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二卷《地语》之“迁海”条：“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十里许，辄有万家之村，千家之砦。自唐、宋以来，田庐丘墓，子孙世守之勿替，鱼盐蜃蛤之利，藉为生命。岁壬寅二月，忽有迁民之令，满洲科尔坤、介山二大人者，亲行边徼，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资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明年癸卯，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其八月，伊、吕二大人复来巡界。明年甲辰三月，特大人又来巡界，遑遑然以海边为事，民未尽责空为虑，皆以台湾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辗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墓而为深塹，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